

京图书馆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把工作搞的更好,我曾经结合工作对业务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1964年,北京图书馆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根据当时阅览部的安排,由我执笔起草了《关于读者工作中“区别对待”问题》的文章(未公开发表)。该文结合阅览工作实际中产生的问题,论述了“区别对待”原则在阅览工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划分读者、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等原则和方法。这在当时的工作中起了有益的作用,并与后来国务院所批示的我馆重点服务对象的原则精神是一致的。本文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至今仍为我馆阅览工作所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当然“区别对待”的原则并非此文和我馆所首创,苏联早有“分别服务”之说,在我国的科研系

统的图书馆也早已应用此原则。)

近几年来,我又结合工作写过两篇文章,即《谈图书划分与借阅问题》与《谈谈我馆的目录辅导工作》(已公开发表),并与杜克、吴慰慈二同志合作编写《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一书(已出版发行)。

本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进行的更快、更好的。本来,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取得更多的成绩,进步的更快的。但是,十年浩劫给我国各方面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也使我们已到中年的这一代人失去了一段最宝贵的时间。业务能力和学识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知识和技能的老化,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又重视的问题。业务的进一步提高,知识的不断补充和更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发奋图强,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多的贡献,作出更大的努力!

## “人生有限 学海无涯”

谈 金 铠

我于1954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因为学校离馆很近,在校上学期间我就经常到馆里来看书学习,从那时起,北京图书馆这座知识的宝库便强烈地吸引着我。所以,1956年4月我能够来馆参加工作,从进馆的第一天我便爱上了图书馆工作这一行。当然,那时我的思想觉悟并不高,对图书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不十分明确,想得更多的是,来到这样一个学习条件优越的工作岗位,今后可以多多看书,好好学习了。

参加工作不久,党中央便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此期间,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来馆查找资料的人猛增,他们为了发展我国科技事业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从而使我对图书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也开始想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应该如何做好为读

者服务的工作,在向科学进军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但是当时毕竟因为自己参加工作时间短,业务水平低,工作能力差,而大有“力不从心”之感,心里十分焦急与不安。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学,刻苦地学,快马加鞭地学,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及业务工作的需要。“文革”前,我馆是晚九点半钟闭馆,我几乎每天都学习到闭馆时才离馆回宿舍,就是节假日也很少有例外。

要想学习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有刻苦的精神,其次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学,切忌好高骛远。当时,我对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必须从基础知识学起,以后又进入图书馆红专大学学习,学习逐步深入和系统化。我做西文期刊工作,学习外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自学英语，以后又进入北京外语学院夜校学习，平时再结合业务工作学习，外语水平逐步有了提高。

通过几年功夫的学习，初步取得一些成果。1961年我总结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并参考国外的有关资料，编写了《西文期刊著录条例》初稿，这对提高我馆西文期刊的编目质量，起了积极作用。1964年在我馆首次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提出《谈谈西文期刊的著录问题》一文，文中主要对团体著录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年，我馆的部分同志与人民日报图书馆部分同志合编《新华日报索引》，这是一部比较大的索引，共分九册出版，我负责1946——1947年最后一册的编辑工作，整整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基本上保证了编辑质量。1979年我还组织和参加了与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的《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的工作，该书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通过学习与实践，对索引工作的理论与方法也加深了认识，并发表了一篇《评〈全国报刊索引〉》的文章。

十年浩劫时期，我被当做“白专道路”典型遭到批判。当时我是口服心不服。还尽可能找机会学习，比如学习英文版《毛选》，取得“一举两得”之效。

由于业务能力提高了，为读者服务也就有些办法了。例如，1959年北京礼花厂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准备制造新花样焰火，到我组查找资料，我便给他们编了一份《十年来国外有关焰火制造技术资料目录索引》，他们感到很满意。北京建筑设计院为了设计首都体育馆，查找有关体育馆建筑设计资料，我也给他们编了一份国外有关这方面资料的目录索引，对他们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帮助。此外，如世界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查找有关印度的土地与农民问题的资料，吉林大学经济系教师查找有关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问题的资料，我都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所需资料，并通过工作，还与他们建立了很好

的关系。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应该如何对待读者，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他们服务的，我在这方面做得虽然还很不够，但我是在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不仅把外语学习直接用于业务工作，而且还搞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笔译。自1978年以来，我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伦敦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瑞典的仲夏节》、《冰雪上的狂欢节》等介绍外国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方面的文章约三十篇，还编写了一本《外国风俗趣谈》一书，约十五万字，已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有些图书馆工作者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喜欢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写一些看来似乎与图书馆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因此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其实，图书馆工作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包，图书馆员要想做好本职工作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因此他们在哪一方面能够有所成就，对于图书馆工作本身都会有益处的。

1980年以来，我开始做西文社科期刊的采访工作。我对国外期刊出版情况比较熟悉，基本上能够根据我馆的采访方针保证选刊质量。

从去年初我被临时调到西文期刊机读目录小组工作，开始时与几位同志共同编西文期刊著录条例，随后做西文社科期刊机读目录数据编制的总校工作。这是我馆首次利用现代化技术——电子计算机编制目录的一项试验性工作，可以说为实现图书馆工作现代化迈出可喜的一步。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我已年近五十，回顾过去，我虽然在学习与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并且在这次评定职称时被评为馆员，这无疑对我是一个很好鼓励和鞭策。展望未来，深感自己学习和工作的任务还是很重的，但是我有信心，通过不断地学习，把工作进一步提高。